

中国
图书
年鉴

1997

ZHONGGUOTUSHU
NIANJIAN

中国图书年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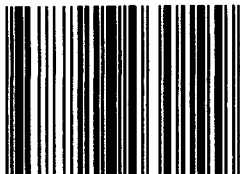
ZHONGGUOTUSHU
NIANJIAN

1997

杨牧之 主编

湖北人民出版社

ISBN 7-216-03019-2



9 787216 030199 >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图书年鉴. 1997/杨牧之主编.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1. 1

ISBN 7-216-03019-2

I. 中...

II. 杨...

III. 图书—出版—中国—1997—年鉴

N. G23-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9306 号

中国图书年鉴(1997)

杨牧之 主编

出版: 湖北人民出版社
发行:

地址: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印刷:文字六〇三厂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44

字数:1355 千字

插页:7

版次:2001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 000

定价:95.00 元

书号:ISBN 7-216-03019-2/G·765

中国图书年鉴编委会

顾问	于友先								
主编	杨牧之								
副主编	阎晓宏	吴尚之	路用元	刘鼎华					
编委	(按姓氏笔画排列)								
	于文杰	马元春	马笑然	王 伟	王成法	王 岳	巨 伟		
	石 伟	叶 路	史可荣	白 烨	成云东	任桂香	刘玉山		
	刘艳丽	孙 颢	朱冬生	朱赛玉	伍先华	寿勤泽	苏立功		
	李华文	李显福	李 莉	吴体刚	陈 莹	汪嘉伦	张 炜		
	张 樱	杨旭红	杨德炎	邱久钦	周 思	罗见龙	项纯文		
	赵昌平	胡福生	夏代忠	聂震宁	高洪宝	郭志坤	朗杰平	措	
	殷爱平	黄日星	黄正慧	韩 舞	熊国祯	樊希安	朗 德	博	

中国图书年鉴编辑部

主 任	胡光清				
副 主 任	刘 苏				
文字编辑	卢净璇	刘	苏	李 鹏	赖洁玉
责任分类	李 鹏				
编 务	章 玮				
电子编辑	陈 革				
责任印制	杜义平	肖正华			
责任校对	和晓玲				
美术编辑	梁 巍				

编辑说明

一、编辑《中国图书年鉴》是我国图书出版事业的一项基本建设,其宗旨是总结图书出版工作经验,观察、分析图书出版的现状与发展趋势,为科研、教学、著述、学习和图书出版工作提供系统的参考资料。

二、《中国图书年鉴》与《中国图书大辞典》(1949~1992)的收书截止时间相衔接,对从1993年起国内出版的图书及资料进行收集整理,每年编辑出版1卷,本卷为总第4卷。

三、《中国图书年鉴》(1997)主要反映1996年度全国图书出版工作的状况和信息,其主要栏目有“专论”、“图书分类评述”、“图书出版研究”、“图书市场分析”、“新书简介”、“获奖书目”、“统计资料”、“图书出版纪事”、“索引”等。

“专论”——选载对全国图书出版有指导性意义的重要论文。

“图书分类评述”——特邀国内有关专家、学者及图书出版编辑,对各类图书的出版动向作评论分析。

“图书出版研究”——选录各报刊杂志发表的有关图书出版研究的文章。

“图书市场分析”——汇集图书市场信息,分析其发展态势。

“新书简介”——从当年新版图书总数中,按10%~15%的比例选取优秀图书和有代表性的图书,以条目形式作介评,并按学科分类编排。辞条以介为主,寓评于介,着重反映所诠释图书的基本内容及主要特征。

“获奖书目”——主要刊载该年度荣获“国家图书奖”、“五个一工程·一本好书奖”、“中国图书奖”、“中国辞书奖”的书目。

“统计资料”——汇编该年度全国图书出版情况,使用《中国标准书号》22类图书出版情况,各类课本以及少年儿童读物出版情况。

“图书出版纪事”——记录该年度有关图书出版的重大活动。

“索引”——有“辞目分类索引”和“辞目笔画索引”。“辞目分类索引”以《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第四版)为框架,其编排方式与新书简介的正文相同;“辞目笔画索引”按书名辞目首字笔画数顺序编排。索引前注有使用说明。

四、编辑出版《中国图书年鉴》是一项文化积累和文化传播工程,此项工作得到了全国出版界同仁的关心与支持,在此致以诚挚谢意。由于我们的水平和经验所限,《年鉴》难免有不足和缺憾之处,恳请广大读者和各界人士批评指正。我们将不断改进工作,提高质量,以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

目次

专 论

关于“九五规划”的总体构想	1
对跨世纪出版发展战略的思考	5

图书分类评述

马克思主义类图书出版综述	10
哲学类图书评述	11
社会科学总论类图书评述	13
政治、法律类图书综述	15
经济类图书述评	17
文化、科学、教育、体育类图书出版举 要	19
语言文字类图书述评	20
文学类图书一瞥	22
艺术类图书评述	24
自然科学总论类图书综述	25
天文学、地球科学类图书综述	26
农业科学类图书综述	28
交通运输类图书综述	30

图书出版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版业十大变化	32
我国出版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34
图书出版“精品意识”的喜与忧	36
图书质量与编辑的责任意识	38
略论图书质量与编辑创新	41
“好书”为什么不能获奖?	44
长篇小说的出版现状	46
科普读物出版:敢问路在何方?	48

喜忧参半的中国“辞书出版热”

——辞书专家、学者、领导关于辞

书出版现状的剖析与思考	49
电子图书的崛起	54
三人谈:提高少年儿童读物整体质 量,促进新的繁荣	57

图书市场分析

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大众图书市场	61
中国书业的战略转移 ——第九届首都图书交易会评述	62
出版社的市场调查	65
图书市场中读者心态与读书现状的 调查	69
我国图书市场供需特征分析	72
中文图书出版发行状况与对策思考	75
当前图书市场分析与未来出版社走 势展望	78
概论图书营销	80
建设发行大市场 组织图书大流通	83

新书简介

A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 思想、邓小平理论	86
B 哲学、宗教	93
C 社会科学总论	114
D 政治、法律	124
E 军事	154
F 经济	157
G 文化、科学、教育、体育	201
H 语言、文字	242

I 文学	260
J 艺术	358
K 历史、地理	383
N 自然科学总论	442
O 数理科学和化学	448
P 天文学、地球科学	457
Q 生物科学	470
R 医药、卫生	475
S 农业科学	495
T 工业技术	509
U 交通运输	573
V 航空、航天	577
X 环境科学、安全科学	577
Z 综合性图书	581

获奖书目

1995 年度“五个一工程”奖获奖图书 名单	588
第十届中国图书奖获奖名单	589

统计资料

1996 年图书出版情况	592
--------------------	-----

1996 年使用《中国标准书号》22 类 图书出版情况	592
1996 年各类课本及少年儿童读物 出版情况	594

图书出版纪事

1996 年图书出版纪事	596
--------------------	-----

广告插页

人民教育出版社	1
湖南教育出版社	2
广西壮族自治区新闻出版局	3
湖北省新闻出版局	4

索引

辞目分类索引	604
辞目笔画索引	653

关于“九五规划”的总体构想

杨牧之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九五期间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下称“九五规划”)终于确定下来了。这是一个集中了大家智慧的规划,是一个启人思考的规划,是一个充满理想与激情的规划。现就制定规划的总体构想谈谈我的看法。

一、制定“九五规划”的大背景

要讲清制定“九五规划”的构想,必须做一点回顾,从整个出版工作的态势做分析。

1979年可以作为我国出版业改革发展的一个分水岭。1978年的12月我们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12月,通过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正式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新中国真正开始了腾飞。中国出版业真正开始了腾飞。我国出版社总数,1979年只有105家,到1995年底达到563家,增加了4倍还多;我国年出书总数,1979年是17000种,1995年已经超过10万种,增加了近5倍。

这期间,一大批优秀的图书陆续出版,特别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一系列国家重点图书工程经十余年甚至几十年的编撰,终于在这一时期出版完成,从而形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突出的出版高峰。煌煌74卷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出版,使中国出版业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迄今为止世界上收汉字最多的《汉语大字典》,收语词37万条的《汉语大词典》,全面介绍世界经典学术著作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闻名世界的《中华大藏经》,10卷本《中国通史》(范文澜、蔡美彪主编),给社会和广大读者带来了激动和欣喜。特别是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50卷)和新版《列宁全集》(60卷)的出版,表明了中国马列著作的出版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谈起这些成绩与发展,大家兴奋不已,似乎我们

已经是世界出版的“超级大国”,因为在我们年出书10万种的同时期,美国年出书只有6万种左右,德国5万余种,日本4万余种。但只要我们做些深入的考察,便会发现其中的问题。日本,年出版新书虽然只有4万余种,但年再版书高达20万种,可供书目达30万种。德国,年再版书30万种,可供书目达70万种。再版书与可供书的多少,说明了图书的质量和市场的供应能力,标志着出版业的总体水平。我们国家图书再版率1995年虽然达到了创纪录的41%,但这是包括教材在内的,如去掉教材恐怕不足30%,以10万种计算,也只有3万余种。我们的可供书恐怕也只有10万种左右。这是对一组数字的分析。

再看另一组数字,从1979年到1995年,我国出版社总数从105家增加到563家,增长了436%,而总印张数从135亿印张,仅仅增加到315.41亿印张,增长了134%;总印数从37亿册仅仅增加到62.6亿册,只增长了69%。

从这样的分析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我们的发展还主要是靠出版社总数的增加,也就是规模的扩张,而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的发展主要靠再版书的增加,也就是靠内涵发展。我们的出版业生产要素的数量扩张远远超出生产效率的提高比率,客观上走的是一条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益的路。

而且,由于规模、数量增长过快,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出版社增加过快,缺少合格的经营管理人才和编辑人才,致使图书出版的总体质量难以提高;有的出版社追逐经济效益,抢热门选题,造成品种重复,同样内容的图书几十种、上百种,而相当多的学术著作出版困难;由于内容相近的图书过多过滥,致使一些宣传马列主义、党的方针政策的图书发行量下降,严重影响了社会效益;在这种追逐数量,广种薄收,不顾质量的情况下,拜金主义抬头,买卖书号、非法

出版屡禁不止,严重影响了出版业健康、有序地发展。这是我们出版业不能不面对的复杂状况。

另一方面,中国的出版业又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概括起来是否可以说有三大任务:

1.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两个文明建设对出版业的要求越来越高,不努力提高质量和效益,难以胜其重任。

2. 出版业面向市场之后,出版社不走内涵发展的道路,不努力提高质量和效益,便缺少竞争能力,难以生存与发展。

3. 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中国出版物市场不可避免地要成为世界出版物市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出版业不但要走向世界,与世界名牌出版公司竞争,而且要在国内市场上同外国出版公司一比高下。

一方面是复杂的形势,一方面是艰巨的任务,正是在这种大的背景下面,1993年,新闻出版署党组及时地提出了“推动整个出版业的发展从以规模数量增长为主要特征的阶段,向以优质高效为主要特征的阶段转移”,其核心是提高出版业的质量和效益,以“阶段转移”这个醒目的让人深思的口号把发展战略摆在每一个出版工作者面前。

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建议”提出的“两个根本性转变”的战略,给出版工作指明了方向,第一个根本性转变,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指生产关系的改变,是改革战略,是“体制转轨”;第二个根本性转变,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指生产力发展途径、方式的重大调整,是发展战略,也可以说是“增长转型”。“体制转轨”与“增长转型”相辅相成,给我们国家的改革展示了一个无限广阔的前景。同样,也为我们的出版改革指明了方向、途径和办法。

“两个根本性转变”深化了我们对出版改革的认识,坚定了我们实施“阶段性转移”的信心。因为“阶段性转移”强调优质高效,控制规模数量,与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是一致的;而这个“阶段性转移”的完成,必将促进出版业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

怎样实现增长转型?粗放型与集约型的本质差别在于前者主要依靠生产要素的扩大来实现经济增长,后者主要依靠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和合理构成来实现经济增长。联系到出版业,就是要反对

“广种薄收”,提倡“精耕细作”,要在提高图书质量上做文章。出版业的一切改革都是为了多出优秀图书,有了优秀图书自然有了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正如农业生产的集约经营主要在“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上做文章一样,出版业就是要在提高每一本书的质量和效益上下功夫。

问题已经理清,症结也已明确,关键是要扎扎实实地去干,这就是我们制定“九五规划”的大背景。

二、制定、实施“八五规划”的启示

“八五规划”是由国家主持制定的第一个全国综合性重点图书出版规划。是我国“八五期间”文化建设一项重大工程,代表了当时中国出版事业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依靠各地方、各部门的支持和全国出版社的共同努力,到1995年底,计划中的1169种选题已经完成95%(其余5%,按原计划滚动到“九五规划”中去)。

“八五规划”的实施和完成,产生了重大的社会效益。第一,起到了示范和导向作用。规划中的重点选题是什么,各种图书选题的结构怎样,列入规划的选题数量以及每种选题的规模,都起到了示范和导向作用。第二,国家制定重点图书规划,带动了各级重点图书规划的制定,结果是社有社的规划、省有省的规划,最后是国家规划,这就形成了一个网络,一个抓重点图书的网络。全国上下追求重点,追求精品,必然会促进整个出版事业的繁荣。第三,确实出了一批好书。列入国家“八五规划”的图书出版后,读者普遍反映好,很多重要图书评奖活动入选的图书是“八五规划”的项目。这些优秀图书的出版,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但是,从今天的认识来总结,对执行的情况作回顾,在制定“八五规划”时,由于经验不足和认识上的差距,还存在诸多遗憾、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突出的问题有三点:

一是,很多出版社在申报选题计划时,追求规模、数量、看谁上的多,无形中产生攀比现象。计划确定后,又没有条件完成,不得不中途下马。

二是,对通俗普及读物重视不够,认为既然是国家规划,是重点项目,每个项目就一定要有规模,非得几十卷、几百万字不能拿出手。

三是,规划的制定主要依靠“自下而上”呈报选题的方法,缺少“自上而下”,由“上面”组织,也就是说由国家出版管理部门提出、组织的重大选题。“自

下而上”的好处是从实际出发,集思广益,完成计划有基础,但“自上而下”的办法,可以根据国家的需要,组织力量,共同完成一些重点工程,可以更好地发挥国家、政府的导向作用。

有了制定“八五规划”的经验,结合今天的实际,特别是面对阶段性转移,实现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任务,制定“九五规划”,我们就更有把握了。

三、制定“九五规划”的指导思想

制定“九五规划”,首先要解决好指导思想问题。有的同志认为谈指导思想是老生常谈,事实证明,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就弄不明白任务、重点和主攻方向。制定“九五规划”的指导思想是:坚持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根本指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全党全国工作的大局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重点是加强、深化、拓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图书,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各种重要问题研究的图书,优秀的通俗普及读物和优秀的文艺作品。

其次,“九五规划”要有时代感。“九五规划”不是“八五规划”,不能像有的出版社那样,不论“八五”、“九五”,就是那些东西。“九五规划”的时代特点在哪里呢?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建议》,对本世纪末和21世纪的奋斗目标作出了比较科学、完整的概括,提出了具体的要求,我们制定“九五规划”,就应该面向21世纪,把目光定位在21世纪。在未来的十几年内,我国人民生活将由温饱进入小康;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技术竞争更加激烈;经济增长方式将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国际关系中竞争与合作、矛盾与协调、斗争与妥协将更加错综复杂。在这种大的背景下面,我们应该更加坚定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努力弘扬社会主义主旋律,要用符合社会发展时代需要的新观念,努力把我们的图书同这样一个时代结合起来,与当代思想结合起来,与现代科学的进步结合起来。

第三,我们的图书要努力做到思想性、艺术性和可读性的高度统一。好书不是书架上的摆设,不是库房里卖不出去的存货,好书要有人买,有人看。为此,我们要努力创新,写别人没有写过的内容,用别人没

有用过的形式,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用千变万化的出版物和始终如一的价值取向,反映今天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

第四,要处理好“雄心壮志”与“量体裁衣”的关系,反对“广种薄收”,主张“精耕细作”。数量并不是一个出版社水平的最重要标志,数量与质量、规模与效益要有合理的比例,在安排计划时,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量体裁衣,扎扎实实地实现规模数量向优质高效的转移。

第五,在制定规划的方法上采取“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原则。“自上而下”方面的选题,要更鲜明地体现导向,要尽量征求科研、高校的意见,要把国民经济与社会各界的重大科研规划与“九五规划”衔接起来,充分反映各界的研究成果,努力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

四、“九五规划”的结构与特点

(一)规模

“九五规划”总计有1200个选题,比“八五规划”的1169个虽然多31个,但总体上来说数量持平。这个数字是合适的。太少了,几百种形不成规模,而且各个门类很难平衡;太多了,不符合我国出版业的实际情况,不符合控制规模数量,提高质量效益的原则。

(二)结构

1. 基础部分

“九五规划”的主要内容是全国各出版社的重点图书选题。所谓“重点图书选题”主要是指能代表学科领域发展水平的著作。这些著作的选题是“规划”的基础部分。在1200个选题中这部分占963个,即占整个“规划”的80.2%。其中社科类:353个;文艺类:181个;科技类:299个;专题类(包括教育类、古籍整理类、少数民族文字类图书):130个。

2. 子系统部分

这个项目是“九五规划”新设计的,但这些内容“八五规划”中都有。把它们列成“子系统”,突出出来,目的是要表明规划对这些方面的重视。

第一个子系统是“重大工程出版计划”。“重大工程”是指能代表国家水平的权威性著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许多重大工程,如《中国大百科全书》、《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中国美术全集》、新版《列宁全集》等等相继完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带动了中国出版业的发展。目前,正在进行的重大工程已经不多,“九五”期间,中国出版界有什么

重大工程献给读者,献给21世纪,这是设立这个“子系统”的目的。

第二个子系统是“通俗读物出版规划”,第三个子系统是“科普读物出版规划”。应该说“通俗读物”是个大范畴,它自然应该包括“科普读物”,之所以分列二项,“通俗读物”子规划主要指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普及读物,而“科普读物”子规划,顾名思义,是指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普及性读物。

设立这两个子规划是经过认真考虑的。首先从形势的发展来看,要提高我国国民的文化素质,重视并搞好通俗读物的出版是重要的一环。我国有12亿人口,其中中等包括中等以下文化水平的人就有8个亿左右。这8个亿,正是我们最大数量的读者,我们不能出好适合他们理解能力、接受能力、审美能力的书,出版工作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一句空话。另外,如果我们拿不出一批广大读者喜闻乐见的通俗读物,坏书就不会被赶出市场。所以,通俗读物的出版还关系到“打非扫黄”能否进行到底的大问题,我们应该高度重视。

对于“科普读物”子规划,我们更应多说几句。小平同志说:“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现在这个理论已为历史所证明。科学技术的发展靠什么?一靠科学技术自身的进步,二靠科学技术普及的广度和深度。这个论点也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人们已经认识到虽然耕地、森林、淡水等资源有限,但人的智慧是无穷的,有了掌握科学知识的人,就什么也不怕了。最近美国制定了一个“2061工程”。2061年哈雷彗星重返地球,美国有关部门以这一年为契机,要用几十年的时间将一代美国人培养成具有高度科学素养的人。美国这样科学技术发达的国家尚且如此,我们就更应该重视科普工作了。设立“科普读物”子规划正是出于这样一个考虑。

第四个子系统是“少儿读物出版规划”。建设21世纪靠今天的青少年一代。他们是祖国的未来,是建设21世纪的主力军,我们要出版一批优秀的有利于对少年儿童进行思想品德教育、智力开发和现代化科学知识启蒙教育的读物。

此外,“规划”还列入了少量的电子出版物。虽然项目不多,但也是一个方面,我们试图体现两个目的:一是客观反映目前我国电子出版物的状况;二是对电子出版表示关心和支持。

3. “规划”中重点图书的列入情况

“规划”的骨干是它的“基础部分”,这部分很鲜

明地体现了“九五规划”的重点:

(1)对于加强、深化、拓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著作的选题放在首位。此类选题总计有40余个,约占“基础部分”社科类的10%强。突出的有《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问题》(龚育之等著)、《邓小平关于经济改革总体设计思想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蒋绍进著)、《邓小平关于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战略思想研究》(钟哲明著)、《邓小平新时期思想史》(冷溶等著)等。这些选题努力结合时代特征和我国现实,深入研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继承、运用与发展。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重在研究这一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历史地位和伟大意义,以及这一理论的科学体系和它在各重要领域的新思想、新观点。

(2)突出了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各种重大问题研究的选题。此类选题数量多,占的比例大。以经济类图书为例,“基础部分”共收入经济类选题89种,占基础部分总数的9.2%。从选题策划的内容来看,许多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急需作出回答的重大理论问题,如《经济增长与反通货膨胀政策的比较研究》(史晋川等著)、《国有大中型企业活力研究》(李占祥著)、《中国第三步战略的整体构想》(中国社科院经济所)、《中国的贫困与反贫困战略研究报告》(康晓光著)等。

(3)反映现实社会生活,弘扬时代主旋律,尤其是反映改革开放、经济建设中中国人民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的长篇小说有很大突破。一方面广大作家深入生活,认真创作小说;另一方面出版部门,尤其是文艺出版社,纯文学的比重加大,高品位的图书选题增多。海峡文艺出版社的《中国小说名家新作》丛书、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小说界文库》、四川文艺出版社的《中国西部文学》丛书、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当代军事题材长篇小说》等等,都很值得关注。

(4)“重大工程出版计划”形势喜人。根据“规划”的需求,已列入8个项目,它们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研究书系》、《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大中华文库》、《中国儿童动画出版工程》(即“5155工程”)、《当代青年科普文库》、《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华大典》、《中国科学技术文库》。8个项目,各具特色。如系统阐述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研究书系》,由中宣部组织编写,目前收入该书系的图书

已有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编写的《邓小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宋德福的《邓小平人才理论》,田增佩的《邓小平外交思想》,于永波、徐才厚的《邓小平军队和国防建设理论》,郑克扬的《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中宣部的《邓小平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等,该书系以江泽民同志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九个方面的阐述为基本框架,吸收各方面研究成果,形成一套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比较系统、权威的著作。又如向世界原原本本介绍中华民族文化的《大中华文库》则试图把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中产生的哲学、政治、经济、历史、文学、科技等方面最有代表性的著作,组织权威人士,译成英文,系统地介绍到世界去,以弘扬中华民族文化,让世界了解中国。这是一件了不起的文化工作,它的立项和完成必将产生深远影响。再如面向 21 世纪的大型科普丛书《当代青年科普文库》。我国科普读物,尤其反映最新科学技术的科普读物十分缺乏。这个“文库”将组织国内最好的科普作家,编写一套面向现代、面向 21 世纪的大型系列丛书,以传播普及自然科学技术为主,以交叉科学、社会科学知识为辅,将高新技术、自然奥秘、世界探索介绍给青年一代,相信它将成为一套好书,并在科普读物的编写和出版方面起个好的导向作用。

(5)另外三个子系统:通俗读物,科普读物,少儿读物,虽然角度不同,不过是各有侧重,本质上都属于通俗普及读物。设计三个子系统,正是为了强调通俗普及读物的重要。从“规划”的列选情况来看,这个目的基本上达到了。通俗读物共列入 58 种,占规划总数的 4.9%;科普读物共列入 74 种,占规划总数的 6.2%;少儿读物共列入 85 种,占规划总数的 7.1%。

(6)翻译图书得到重视。近年来翻译图书的出版数量锐减,一个原因是,自从我国加入国际版权公约以后,翻译国外图书要得到授权,要签订合同,手续上要求严格;另一个是经济原因,要付版税,而一些新的、有价值的图书,常常版税很高,出版社承受不了,也没有把握,所以,近几年翻译图书的出版严重滑坡。有一家很有名的出版社,过去每年安排翻译图书占全年总数的 40%,近两年下降到 5%。近两年,这种情况有所好转。为了鼓励引进国外优秀的图书,在制定“九五规划”时尽量予以倾斜。规划中列入翻译类图书 35 种,280 卷册,这个数字虽然仍然不是很理想,但导向意义还是很清楚的。有一些很有价值的选题,如《新世纪学术译丛》(中央编译出版社),将收入 20 世纪 80—90 年代外国著名思想家的学术代表作;《经济学译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专门收入介绍国外经济科学理论发展新概况的图书;《欧美汉学名著译丛》(漓江出版社),收入国外汉学家 80、90 年代关于中国文化的研究成果。这几套丛书之所以值得介绍,主要是因为它们收入的都是 90 年代前后的著作,不同于过去一些出版社翻译的重点集中在古典名著的作法。

“九五规划”从 1995 年 3 月 15 日发出制定规划的通知起,经过一年多的时间,经过 14 次专家论证,又在全国新闻出版局长会议上征求了意见,上上下下,上下结合,终于确定下来了。1996—2000 年是本世纪的最后五年,是实现本世纪末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目标的关键五年。我们一定要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努力完成这一跨世纪的文化建设工程,为中国的繁荣富强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原载《中国出版》1996.10.)

对跨世纪出版发展战略的思考

刘 果

- 国家应当增加对出版事业的投入
- 应当明确在出版社停止承包制,代之以现代企业的管理制度
- 出版与发行不能简单说谁是龙头
- 建议确认供销社和国有发行单位一样,是图书发行的主渠道
- 优化选题是提高图书质量的重要一环

●21 世纪的出版史,将以电子出版物的发展和成熟为其重要特征

第一,出版工作要加强,要同经济发展战略相适应,出版事业的发展规划要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

今后 15 年是跨世纪的,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中央已经制定跨世纪的宏伟纲领。五中全会要求加强出版工作,并且要求出版工作同经济发展战略相适应。这是我们研究问题的出发点。

出版工作要服从、服务于全局。全局对图书出版的需求是多方面的、多层次的。“相适应”就是要尽可能满足全局的需求。这里涉及两个问题:出版工作的基本任务和多种功能。

一是出版工作的基本任务。

1983 年以来有一个提法,就是“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传播一切有益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丰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根据实践的发展,这个提法似乎有两点应当考虑加以补充。其一,作为宣传的重要任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后,似应加上“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个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实现跨世纪宏伟纲领的理论基础。毫无疑问,出版工作对这个理论的宣传还应当继续大大加强。其二,对“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似应加上“健康有益”的定语。因为这些年在丰富文化生活的名义下,夹带了一些格调低下、消极有害的图书。这是个教训。

二是出版工作的多种功能。

出版工作既是宣传教育工作,又是科学文化工作,应当全面理解,不可偏废。两个方面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彼此都不能取代,两个方面都需要加强。宣传教育方面的图书,要提高针对性和可读性,力争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科学文化方面的图书,要提高学术品位、文化品位。出版工作这两个方面的功能,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思想道德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的两个方面是对应的。因此,无论是宣传教育的图书,还是科学文化的图书,也无论是提高的图书还是普及的图书,都必须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原则。

同经济发展战略相适应,还要求出版部门为自己确定相应的奋斗目标。这个奋斗目标应当包括两个方面,即:出版体制改革和出版事业发展。改革和

发展,两者互相联系又互相促进。实现出版事业的跨世纪奋斗目标,同样要求在出版领域也实现两个转变。这两个转变,同五中全会提出的“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是对应的。

出版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新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能不能设想:“九五”期间初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求、又符合出版规律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到 2010 年使之比较完善,并进一步提高其规范化、法制化的程度。

出版事业发展的目标是争取和保持图书的出版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基本适应。能不能设想:在保证提高图书质量的前提下,“九五”期间基本扭转种数增长过快和印数、印张数徘徊不前的局面,到 2010 年争取新书种数的增长控制在每年递增 1—2% 的幅度之内,印数和印张数的增长争取达到每年递增 3—5% 的水平,以此缩短在人均占有图书数量上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出版事业的发展规划要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不仅有出版部门发展生产的指标,还应有国家在人、财、物和科技等方面扶持出版事业的指标。国家应当增加对出版事业的投入。

第二,在出版部门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求、符合出版规律的出版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这是改革的要求。五中全会指出,“要积极探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搞好精神文明建设的新思路、新办法”。出版体制改革对应于五中全会提出的带有全局意义的一个根本性转变,就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出版体制改革也要实现这个根本性转变,其中特别要解决好出版单位从传统的生产型向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生产经营型的转变。

作为探讨,提几个实践当中出现的问题。

一、出版社的改革,集中了出版体制改革的特点和难点。

从农村改革引进的承包制,在出版社已经试行了大约七八年,现在应当有一个判断了。承包,对于加强责任制确实起过积极作用。但是,出版社同农业比较毕竟有很大的不同。家庭联产承包的农业,是集体所有制经济,生产规模小,生产力水平低。出版社

是国有经济,经营规模比较大,技术水平接近现代化,既是信息产业,又承担着精神文明建设的重任。在出版社实行承包制,很容易助长单纯追求经济效益的偏向,有损出版社作为整体所必需的统筹安排,更不利于规模经营和集约经营,使短期行为和只顾局部、不顾全局的问题越来越明显。因此我认为,应当明确在出版社停止承包制,代之以现代企业的管理制度。

二、出版社由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的转变和发行体制改革的推进,突出了出版和发行的关系。

出版和发行谁是“龙头”的争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出版和发行的关系,相当于生产和流通的关系。社会生产过程包括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缺一不可。一般说来,生产起着决定的主导的作用。但是,反过来,分配、交换(流通)和消费对生产起着促进或者阻碍的反作用,这个反作用也是不能忽视的。因此我不赞成简单地说是“龙头”,我也不赞成在出版社从地位的轻重上提出“小编辑部、大发行部”。因为我至今仍然认为,“编辑工作是整个出版工作的中心环节”。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首先也要从编辑工作做起。适应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求,更不能削弱编辑工作。我主张,出版和发行,互相支持,互相推动,共同前进,共同发展。

三、图书市场由出版单位、发行单位和读者组成。

我们在改革中要建设什么样的图书市场?这也是一个长期奋斗的目标。关于图书市场的提法不止一种,各有侧重。我一直主张,需要逐步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图书市场。五中全会指出,要“逐步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这个原则要求应当适用于图书市场的建设。当然,需要结合图书出版和发行的实际作出具体解释。就图书市场而言,统一,就是有统一的改革要求、统一的方针政策、统一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标准;开放,就是全国四通八达,打破地区的封锁和部门的封锁;竞争,就是在图书发行中比质量、比效率、比服务,优胜劣汰,以促进整体水平的提高;有序,就是图书发行单位依法经营,各级管理机关依法管理,逐步达到市场行为的法制化、规范化。这四点互相关联成为整体。我希望对图书市场的提法能够一致,以促进图书市场的建设顺利进行。

附带说一下,发行体制改革中多种经济成分的关系问题。五中全会指出:“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方

针。”在这当中,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按照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要求,国有发行单位是主渠道。国有发行单位包括新华书店和其他国有发行单位,其中主要部分是新华书店,五中全会还指出:“国有商业企业和供销合作社要转换经营机制,在竞争中充分发挥主渠道的作用。”可是在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要求里,供销合作社的地位不是很明确的。实际上,农村供销社在广大农村地区的图书发行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因此我建议,确认供销合作社和国有发行单位一样,是图书发行的主渠道。集体所有制属于公有制。除了供销合作社以外,在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要求里,我们一直是把集体的发行单位和个体的、私营的发行单位放在一起,作为国有发行单位的必要补充。实际情况是,有些集体发行单位,或者管理不善,或者属于假集体、真个体,常有违规行为。如何按照中央关于多种经济成分的政策精神,又结合图书发行的实际情况,在改革中给供销合作社以外的真正集体所有制的发行单位予以恰当的定位,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第三,推动整个出版业的发展从以规模数量增长为主要特征的阶段向以优质高效为主要特征的阶段转移。

这是发展的要求,是发展思路的转换,是同五中全会提出的带有全局意义的另一个根本性转变,即“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相对应的。

作为探讨,也提几个实践当中出现的问题。

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两者精神是一致的。

这是指经济领域。在出版领域呢?优质高效是一个提法。从粗放经营转变为集约经营,也是实现优质高效的必由之路。优质高效,先有优质,后有高效;只有优质,才能高效。高效,包括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作为出版领域发展的要求,当然不可以照搬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过去提过,以提高图书质量为中心。现在看来,好像提高质量本身成了目的。以优质为手段,以高效为目的,可能更为合适。因此,作为出版领域发展的要求,能不能概括为: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这里讲的“统一”是什么涵义?社会效益好和不好、经济效益好和不好,排列组合,可以出现四种情况。两个效益都好或者两个效益都不好,这个取舍容易决定。它们都是“统一”的,不过前者是正面,后者是负面。需要

斟酌的有两种。一种,社会效益不好,经济效益好,不义之财,有诱惑力。我看可以套用一句话: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以牺牲社会效益为代价去赚取经济效益。另一种,社会效益好,经济效益不好,为了社会效益,需要国家或社会扶持,也需要出版社做贡献。出版社做贡献,以盈补亏,这是通例,但是,要量力而行,要统筹安排。当然,从长远来讲,社会效益确实好、而经济效益不好的图书,对出版社也不仅限于做贡献。这类书,其中有些可以一再重印,从而由亏损转为盈余。此外,这类书提高了出版社的声誉,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化为经济效益。所以,这里讲的“统一”不是指的一本一本书,而是指的一个出版社的统筹安排和优化经营。总之,排列组合的四种情况,两种可取的都是社会效益好,这就是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一盈一亏,以盈补亏,保持生产和扩大再生产,这就是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

附带说一下,现在常用的“双效书”这个词本身没有毛病,实际情况是,真正够得上社会效益好的并不多。往往是经济效益不错,社会效益谈不上,不过内容没有错误,或者有点“擦边球”,这就出版了,这是目前平庸图书甚多的一个原因。这种抓“双效书”的做法恐怕不足为训。

二、出版工作的“阶段性转移”内涵丰富,不单是减少数量和提高质量,需要作出具体解释。

为了顺利实现转移,从整体上看,十六字方针还有用处。有关图书出版的十六字方针是:调整结构、优化选题、控制品种、提高质量。这十六个字、四句话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是一个整体。它包括了宏观的要求和微观的要求。图书出版要适应多方面、多层次的需要,首先就有一个结构合理化的问题。宏观范围和微观范围都需要进行必要的调控,以保持图书出版结构的合理化,避免一个又一个热点冲击,造成结构上的畸轻畸重。结构性的缺陷,是图书整体质量的缺陷,不容忽视。以优化选题为目的的选题论证会,首先要考虑的就是整体结构的合理化,这是选题取舍的一个标准。选题取舍的另一个标准,是选题本身的质量,以及对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评估。选题好,下边的文章才好做,当然要下功夫。选题不好,即使下功夫,下边的文章也难做。所以,优化选题是提高图书质量的重要一环。而控制品种,可以集中必要的人力、物力、财力,是提高图书质量的重要条件。当然,除了前提和条件之外,提高图书质量本身还有大量工作要做,这也是十分重要的。不过这里不必细说。至于减少数量,也还要具体分析。种数太多,要压

缩。但从长远来讲,不可能长期停止不动或者负增长。倒是印数和印张数,好几年徘徊不前,甚至有所下降。这不是好现象。所以在转变当中,还要想方设法,使这两项数量增上去。这两项数量的增长又有赖于图书质量的提高和图书再版率的提高。再版率是出版社成熟的标志之一。总之,该控制的要切实控制,该增长的还要努力增长。

三、五中全会指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归根到底要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关键是抓好科技和教育。”这个精神对出版领域同样适用。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出版的发展同样离不开科技进步。我呼吁过出版部门的各级领导重视科技进步,因为这也就是重视发展生产力的要求、重视现代化的要求和重视市场竞争的要求。

出版业要满腔热情迎接新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以电子计算机技术和激光技术为基础的新技术,像鼓帆的劲风,正在把我们出版业的航船推向新世纪。

迎接新技术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个是传统的印刷出版物,尽快用新技术武装起来。激光照排、电子分色、胶版印刷、装订联动的书刊印刷技术改造的要求有些部分已经被超越了。出版对印刷的需求是多品种、小批量、高质量、短周期。满足这个需求还有差距。书刊印刷的进一步技术改造,还联系着书刊印刷的改革和改组。要看到,书刊、电子、建材、包装等多种印刷的综合经营,较之单一的书刊印刷更有利于积累技术改造的资金,也更有利于印刷技术的发展和提高。

另一个是新兴的电子出版,方兴未艾,势不可挡。技术上应当迎头赶上。发展的规模、速度和结构需要根据国情,作出合乎实际的安排。对这方面日益高涨的积极性要保护和引导,既要避免落后于实际,也要避免超过实际许可的程度。要十分重视资源和市场的调查研究。对电子出版物的行政管理要尽快实施,接受音像出版行政管理的经验和教训,争取早作规范。电子出版物不可能完全取代印刷出版物。电子出版物早期的发展需要借助印刷出版物的人才、经验和成果。同时要抓紧培养电子出版物的编辑人才、设计人才和经营人才。可以预期,21世纪的出版史,将以电子出版物的发展和成熟为其重要特征。

四、出版领域实现跨世纪的发展战略目标,必须有一批跨世纪的优秀出版人才。

优秀出版人才应当是高标准。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仍然应当是我们出版队伍,特别

是编辑队伍建设的基本要求。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100 年不动摇,这就是革命化的重要内容。我是主张编辑学者化的。编审的条件就相当于学者的条件。比之一般学者更为不易的是,编辑必须具有某一种或某几种学科的专业知识,又必须懂得和熟悉编辑专业。提倡编辑学者化是一种不断提高自身素质的要求。它有助于编辑工作质量的提高,有助于图书质量的提高,更有助于整个图书出版业文化水准的提高。不过,有的同志提出“要当编辑家,不当编辑匠”的口号,我却不敢苟同。我们当然十分重视编辑的创造性的充分发挥。同时,编辑工作做得非常严谨,规规矩矩,一丝不苟,也是非常宝贵的。这在现在尤其可贵。创造性的编辑活动是需要的,规范性的编辑活动也是需要的,两者并不矛盾。

人才的培养和使用,不可不引入竞争机制。这涉及落实“三项制度”的改革。不如此就不能真正打破“大锅饭”和“铁饭碗”,就不能真正做到人尽其才。引入竞争机制,就要求人事工作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有些出版单位人员“近亲繁殖”,能进不能出,导致素质下降,人浮于事,是个大难题。这个难题不解决,队伍的优化、单位的优化难以实现。

五中全会再次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我们要认真执行,很好地发挥人才的作用,推动事业的发展;同时很好地倡导敬业创业精神,鼓励中青年同志刻苦努力,把自己造就成为跨世纪的优秀出版人才。

(原载《中国图书商报》1996.1.)